

汉字与朝鲜半岛吏读文的关系及影响*

金永寿 尚咏梅

[摘要] 朝鲜半岛接受和使用汉字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汉字扎根于朝鲜半岛，并被直接使用的同时，经过本土化改造，造出了利用汉字的形、音、义记录朝鲜语的吏读汉字书面语。吏读文的使用极大地丰富了朝鲜语的语音、词汇系统，进一步加深了对汉字功能和朝鲜语结构的理解，为训民正音的创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汉字 朝鲜半岛 吏读文 本土化 影响

一 引 言

汉字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化宝库做出的最伟大贡献之一。汉字在东亚地区的传播和使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汉字文化圈”。其中，朝鲜半岛的语言文字与汉字、汉文的交流历史最为悠久，所受影响也最为深刻。朝鲜语和汉语的语音系统、句法结构不同，差异显著，但由于长期的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两者之间形成了特殊关系。汉字、汉文传入朝鲜半岛以后一直到19世纪末，在漫长的岁月中，汉字、汉文始终作为第一通用文字和第一书面语，对朝鲜半岛的语言文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历史上曾经作为官方书面语的吏读文就是借用汉字的形、音、义记录朝鲜语的，公元1444年创制的“训民正音”也是参照了汉语音韵学的原理。因此，系统地研究汉字与朝鲜语吏读文的关系，研究汉字、汉文与朝鲜语言文字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内关于汉字形成、演变、发展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关于汉字对外传播的研究也成果颇丰。其中，李得春（1992）、杨昭全、何彤梅（2001）、陆锡兴（2018）等对汉字传播到朝鲜半岛的时间、路径，汉一朝语言、文字的关系等方面做了考证和论述。在朝鲜和韩国，围绕汉字研究成果也很丰富，但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朝鲜语史框架内的汉字、汉字音研究，如，崔南熙（2006）、金武林（2015）等，即使是涉及吏读文的研究，也是从吏读汉字与朝鲜语关系的角度探讨的多，如，洪起文（1957）、吴希福（1999）、南丰铉（2000）等，基本上都是倾向于以朝鲜语演变为基点的朝鲜语和吏读文的关系研究。纵观国内外研究，对汉字传播到朝鲜半岛以后在本土化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形式以及功能的演变，缺乏深入的研究。为此，本文从接触语言学的角度，审视汉字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探讨朝鲜语吏读文与汉语的互动关系以及汉字在朝鲜半岛的本土化对朝鲜语言文字的作用和影响。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朝鲜汉字资源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306）”和延边大学外国语文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公关科研项目（18YLG01）的阶段性成果。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二 汉字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乡札式、口诀式诵读法

汉字、汉文何时传入朝鲜半岛，何时成为朝鲜语书面语，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只能依据历史文献、出土的古币以及发掘的壁画、碑文予以追溯。《尚书大传》^①载：“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关于这一箕子朝鲜说，杨昭全、何彤梅（2001:13）从中朝两国史籍、出土文物和在朝鲜半岛的古迹等三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另外，《史记》《汉书》等古文献中也有公元前194年燕国的卫满率千余人到朝鲜半岛建国的记载，还有公元前108年汉朝推翻卫满朝鲜，在朝鲜半岛北部和中部地区设立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的记载^②。尽管这些文献中没有关于汉字传入朝鲜半岛以及使用汉字的具体实录，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公元前开始，中国和朝鲜半岛就已经有了密切的接触和交往，汉字、汉文也已传入朝鲜半岛。此外，在朝鲜境内出土的许多古币以及壁画、碑文等也都支持汉字公元前就已传入朝鲜半岛的事实。例如公元前222年所铸的刻有汉字的青铜器秦戈、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硬币、西汉元帝时的铜钟等都是佐证。为此，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最迟公元前2、3世纪汉字就已经传播到了朝鲜半岛（陈榴2007:9）。

随着汉字的传播，汉文及汉文书籍也流入朝鲜半岛，特别是儒教经典、汉籍佛经的传入，在朝鲜半岛兴起了推崇汉文化，学习、使用和研究汉字、汉文的热潮，而且经久不衰。据史料记载，早在4世纪，朝鲜半岛就已设有太学、国学等教学机构教授王族、贵族子弟汉字、汉文。由于汉字是形、音、义统一的表意文字，使用汉字的前提是掌握汉字的字形、字音和字义，而朝鲜语属于多音节语言，当时也没有相应的文字及书面语系统，因此，汉字书面语与当时朝鲜语口语之间存在言文不一致的矛盾。为此，在汉字教学的初期阶段，教者通过汉语与朝鲜语读音和语义的比较，让学习者把握汉字及汉文的结构特点，即用先读朝鲜语字音、后读汉字音的口译方式教授汉字。如“人”读为“사람[sarem] 신[tsin]”，“马”读为“말[mal] 叶[ma]”，“木”读为“나무[namo] 목[mok]”等。其中，[sarem]、[mal]、[namo]分别是“人”“马”“木”三个汉字的朝鲜语读音，[tsin]、[ma]、[mok]则是朝鲜语汉字音。这种用朝鲜语翻译并命名的方法拉近了朝鲜语口语与汉字书面语之间的距离，逐渐形成了汉字的诵读法，称之为“乡札”式诵读。尽管“乡札”式诵读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朝鲜语口语和汉字书面语之间言文不一致的矛盾，但是并非所有的汉字都能采用这种方法，因为有的汉字没有相应的朝鲜语词汇，而且汉字的线性排列顺序体现的是汉语语法单位之间的结构关系，而这种结构关系往往无法对应朝鲜语的各种语法形态，再加上儒教、佛教的传播，单一的口译式诵读法难以满足学习者对汉字、汉文的学习要求，因此，“口诀”式诵读法应运而生。所谓“口诀”式诵读法是在不改变汉文原有结构的前提下，在句中或句末添加朝鲜语词尾以便更好地掌握汉文语义的借音形式诵读法。例如：

^① 出自《尚书大传》卷三《洪范五行传》。

^②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第五十五：“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

口诀文：学而时习之面不亦说乎牙 有朋是自远方来面不亦乐乎牙

口诀译文：학이시습지면 [hakieisuptsimyʌn] 불이열호아 [puliyʌlhoa] 유봉아 [yupunji]

자원방래면 [tsawʌnpaŋremyʌn] 불이락호아 [pulirakhoa]

口诀文中中标有划线的“面”“牙”“是”分别表示朝鲜语词尾“면[myʌn]”“ㅓ[a]”“ㅗ[i]”，假如删掉这些词尾，便与原文完全一致。这种“口诀”式诵读法通过在汉文原文中插入朝鲜语语法形态的方法，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缺少词形变化，主要靠语序和虚词体现语法结构关系的汉语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汉字及汉文在朝鲜半岛的进一步推广和普及。

随着汉字、汉文的广泛使用，借意的“乡札”式诵读法逐渐过渡到借音的“口诀”式诵读法，使得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出现了一词两种标记的现象。例如，现今韩国首尔附近有一座山叫“삼각산[samgaksan]”（三角山），三角山下有一个村名叫“우이[ui]”（牛耳），这个“牛耳”村在当地也被称为“쇠귀[swekwi]^①”，“삼각[samgak]”和“우이[ui]”无论是词义还是语音都没有任何联系，但是“쇠[swe]”表示“牛”，“귀[kwi]”表示“耳”，“쇠귀[swekwi]”是“牛耳”的借意标记，属于“乡札”式诵读法，而“우이[ui]”则是“牛耳”的汉字音标记，属于“口诀”式诵读法。由此可知，山名“삼각[samgak]”和村名“우이[ui]”是同一名称的不同标记。至今，朝鲜半岛的许多地名仍然保留着这种借用汉字的音和义命名的痕迹，如“永同郡本吉同郡”“密城郡本推火郡”“固城郡本古自郡”中“永”“推”“固”是借意字，“吉”“密”“古自”是借音字。

借意的“乡札”式诵读法和借音的口诀式诵读法的出现及使用是汉字在朝鲜半岛本土化的第一步，不仅为当时的朝鲜半岛人民学习和使用汉字、汉文提供了有效的学习方法，也为吏读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三 吏读及吏读文的产生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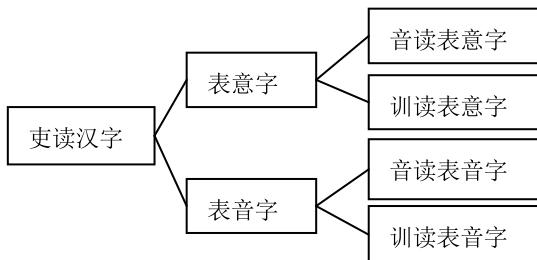
在朝鲜半岛，作为书面语文字的汉字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用作汉文书面语的文字，二是用作记录朝鲜语的文字。汉字是表意文字，通常一个字表示一个语素，而朝鲜语则不同，常常是多个音节构成一个语素。因此，表意的汉字难以准确标记朝鲜语的语素，尤其是语法形态，即使是“乡札”式和“口诀”式诵读法也无法解决这种言文不一致的矛盾。为了能用汉字更准确地记录朝鲜语，古代朝鲜半岛的学者经长期研究，创造出不同于汉语的朝鲜语汉字体系—吏读^②。所谓吏读有广义和狭义的范畴，广义的吏读包括乡札、口诀和专有名词标记^③等，狭义的吏读单指吏札^④。无论是广义的吏读，还是狭义的吏读，其核心在于将汉字作为标记手段，借用汉字的音或义，按照朝鲜语的语序标记朝鲜语口语的汉字体系，利用这种方法撰写的书面语称为“吏读文”。吏读文的汉字体系如图1所示（俞晓红 2019:119）：

^① 朝鲜语中表示“牛耳”的“쇠귀[swekwi]”与表示“三角”的乡札式标记“세귀[sekwi]”是谐音，后来“쇠귀[swekwi]”逐渐替代了“세귀[sekwi]”，成为三角山村的名称。

^② 吏读，亦称“吏道”“吏吐”“吏头”“吏套”“吏札”“吏书”等，传说是古代朝鲜统一新罗时期的薛聰所制，公元7世纪中叶，薛聰将吏读文加以整理，并用来翻译和记录儒教经典（南丰铉 1986:27-28、49-50）。

^③ 用汉字的音和义标记古代朝鲜的人名、地名、官名等。

^④ 吏札是具有朝鲜语语序、吏读词汇和句法形态标志的吏读文。



吏读汉字体系有以下特征：

(一) 表意字

表意字有音、意全借的音读表意字和只借意的训读表意字。

1. 音读表意字

吏读的音读表意字意义和用法与汉语、汉字基本一致。这类汉字在传入朝鲜半岛初期，其读音与汉字基本一致，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些汉字的音、义及用法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类字的特点是离开汉字不能表示独立的意义，而且数量较多，除了个别汉字外，几乎所有汉字都能成为吏读的音读表意字，例如：“东—동[toŋ]”“西—서[sʌ]”“南—남[nam]”“北—北[puk]”“男—남[nam]”“女—녀[nyʌ]”“老—로[ro]”“少—소[so]”。除了上述表示单音节语素的汉字之外，很多表示双音节语素的汉字也纳入音读表意字的范围，如，专有名词“孔子—공자[koŋdza]”“孟子—맹자[mɛŋdza]”“长安—장안[tsanjan]”等，表示抽象名词“哲学—철학[tʂʰʌlhak]”“思想—사상[sasaj]”“生长—생장[seŋdzaj]”等。

2. 训读表意字

训读表意字是摈弃汉字的音，只取汉字的意义，按“乡札”式诵读法标记的汉字，如汉字“村”“牛”“新”译读为“村[mesəl]”“牛[syo]”“新[sai]”等。这类汉字的数量少于音读表意字，因为并非所有的汉字都有对应的朝鲜语固有词，但其使用频率很高。

(二) 表音字

表音字是摈弃汉字的意义，只取字音的朝鲜语汉字，分为取汉字音的音读表音字和取汉字训读音的训读表音字。

1. 音读表音字

音读表音字是在音读表意字的基础上产生的汉字。这类字摈弃汉字的意义，只取汉字的读音。起初，这类汉字用于标记古代朝鲜半岛的人名或地名，如人名“朱蒙—주몽[tsumoŋ]”“居柒夫—거칠부[kʌtʃʰilpu]”，地名“古斯马县—구슬마현[kusulmahyʌn]”“巴衣县—바위현[pawihyʌn]”等；后来随着吏读词尾的出现，开始标记吏读词尾，如用汉字的“那”“赐”“只”等的读音标记“나[na]”“니[se]”“기[ki]”等词尾的音。由于只取字音而不取字义，因此这种标记办法导致了用若干个同音异义字共同标记同一个朝鲜语词尾的现象。如汉字“高”“古”“苦”字，可用于标记朝鲜语连接词尾“고[ko]”等。这种音读表音字还可以标记非独立音节形态，如“隐”字可以标记朝鲜语韵尾“-이[niium]”，“乙”标记“-이[riul]”，“叱”标记“-으[ciot]”等。

2. 训读表音字

训读表音字是在训读表意字的基础上摈弃汉字的读音，只取语义对应的朝鲜语词尾的训读音，如“以”字摈弃其字音，训读为朝鲜语工具格词尾“豆[ro]”音。音读表音字和训读表音字是弥补音读表意字和训读表意字不能完整地标记朝鲜语而创造的标记手段，主要用于标记朝鲜语语法范畴的词尾，尽管其数量不像音读表意字、训读表意字那么多，但使用频率比较高。

吏读文，就是利用上述四类汉字，按朝鲜语组词造句规则记录的书面语形式。其中，这四类字在句子中的组合方式，特别是表意字和表音字的组合规律值得关注。下面，分别引用755年的《新罗华严经写经造成记》（南丰铉 2000:23）和1031年的《净兜寺造塔形止记》（南丰铉 2000:25）里的两段吏读文进行分析。

吏读文：經成內法者楮根中香水散爾生長令內旅然後中若楮皮脫那脫皮練那……佛菩薩像筆師走使人那菩薩戒授令弥齊食旅右諸人等若大小便爲哉若臥宿哉若食吃哉爲者香水用爾沐浴令只但作作處中進在之

汉译文：制作经的办法是往楮树根上浇香水使其生长，然后脱楮树皮或练脱皮……让佛菩萨像笔师、走使人接受菩萨戒，吃食。上述诸人若大小便或躺着睡觉或吃食，用香水洗浴后，方能进制作处。

在这一段中，“佛菩薩像筆師—불보살상필사[pulposalsanphilsa]、香水—향수[hyansu]、經—경[kyeŋ]、法—법[pap]、生長—생장[senjdaŋ]、然後—연후[yʌnhu]、沐浴—목욕[mogyok]、脫皮練—탈피련[tʰalpʰiryʌn]、大小便—대소변[tesobyʌn]、走使人—주사인[tusain]”是音读表意字；“成—일-[il-]、楮—탁[tak]、根—불휘[pulhwi]、散—방-[pit-]、若—호다가[hədaga]、令—시기-[eigi-]、授—반-[pat-]、食—먹-[mak-]、臥宿—눕아자[nupatsa-]、右—을호[olheŋ]、諸—모든[modən]、人—사람[sarem]、用—쓰-[siu-]、作作—질질[t̚ildzil]、處—곳[kot]、進—낫-[nat-]”是训读表意字；“旅—며[myʌ]、那—나[na]、哉—재[tse]、只—기[ki]”是音读表音字；“中—고[kwi]、者—은[un]、等—등[tal]、爲—호-[ha-]、在—견[kyʌn]、之—이[ida]、但—어▷[ʌtsa]”是训读表音字。再如：

吏读文：伯士身寶衆三亦日日以合夫三百四十八并以石乙良第二年春節已只了今闻遣成是不得爲犯由白去乎等用良

汉译文：伯士、身宝、众三人听到第二年春节前日计出348劳工并（搬）石的（令），说了不能完成的理由。

在这一段中，“伯士—백사[peksa]、身寶—신보[einbo]、衆—종[tsuŋ]、合夫—합부[hapbu]、三百四十八—삼백사십팔[sambeksacippʰal]、第二年—제이년[tseipyʌn]、春節—춘절[t̚undzʌl]”是音读表意字；“三—셋[set]、日日—나날[nanal]、并—아▶로[apero]、了—마치다[matshida]、石—돌[tol]、成—이루다[iruda]、不—못[mot]、由—사유[sayu]、白—아▶여다[arweda]”是训读表意字；“亦—이[i]、已只—▷지[kedzi]、今—히[hi]、齊—제[tse]、乙良—을랑[wulraŋ]、遣—고[ko]、去—거[kʌ]、等—▶들[tal]”是音读表音字。

通过上述两段中音读表意字、训读表意字、音读表音字、训读表音字的用例，能够看出吏读文借用汉字的音或义标记朝鲜语的大致规律。具体来说，音读表意字主要用于以下情况：一是标记专有名词，如“伯士”“身寶”“衆”等；二是标记抽象名词，如“經”“法”“生長”等；三是标记部分短语，如“楮皮脫”“脫皮練”“菩薩戒”等。这些音读表意字的特

征是朝鲜语里没有与之对应的固有词，音意全取，其后不能附加朝鲜语的词尾形态，从而奠定了朝鲜语汉字音和汉字词汇体系的基础。训读表意字是摈弃汉字的读音，只取字义的汉字，朝鲜语中有与之对应的固有词汇，如“根”读为“불휘[pulhwi]”等。训读表意字以表示基本词汇的汉字为主，不仅可以表示名词、动词，还可以表示副词等词类，例如名词“人（사람[sarem]）”“石（돌[tol]）”“處（곳[kot]）”等，动词“成（일-[il-]）”“散（흩-[pit-]）”“授（받-[pat-]）”等，副词“日日（나날[nanal]）”“不（못[mot]）”等。由于这类训读表意字所表示的词义在朝鲜语中都有对应的固有词汇，所借的是汉字的字形和字义，并且词干上常常附加表示朝鲜语语法意义的词尾，所以像“三亦”训读为“셋이[seeti]”，“日日以”训读为“나날로[nanalro]”，其中“亦[i]”是音读表音字，“以[ro]”是训读表音字，分别表示朝鲜语的主格词尾“이[i]”和工具格词尾“로[ro]”。

表音字不同于表意字，借用汉字的读音或训读音来标记朝鲜语的词尾、词缀和韵尾等。音读表音字主要用于下列情况：一是附在词干或句末，标记主格词尾“亦—이[i]”、并列词尾“乙良—을랑[uulran]”、连接词尾“遣—고[ko]”“旅—여[mye]”、选择词尾“那—나[na]”、终结词尾“齊—제[tse]”等；二是标记词缀的音值，如“只—기[ki]”“今—히[hi]”“去—거[ka]”等。训读表音字与音读表音字相反，利用汉字的训读音标记下列情况：一是表示语法形态，如位格词尾“中—과[kwi]”、工具格词尾“以—로[ro]”、终结词尾“如—다[ta]”等；二是标记辅助语义语素，如“但—아니[anisa]”“在—건[kyan]”“飛—나[n]”等。

在古代朝鲜半岛，吏读汉字的使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单用音读表意字阶段，这一阶段的音读表意字与汉字基本一致；第二是音读表意字和训读表意字并用的阶段，为的是缓解汉字书面语与朝鲜语口语不一致的矛盾；第三是采用汉字表音功能的阶段，这一阶段是结合使用表意字与表音字的阶段，形成了表意字在前、表音字在后的标记形式。

吏读汉字，到了统一新罗时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按朝鲜语的语序排列汉字词汇，偶尔掺杂吏读（朝鲜语）词汇；二是按朝鲜语语序排列汉字词汇，同时使用吏读（朝鲜语）词尾；三是几乎全用汉字标记词汇^①和吏读（朝鲜语）词汇，偶尔穿插汉字词汇并广泛使用吏读词尾。吏读的这三种形式客观地反映了吏读的发展过程。在10世纪初，吏读文的使用比较普遍，11世纪和12世纪初的“乡歌”^②和“均如乡歌”^③等都采用了吏读文的形式。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实施和固有地名汉字化等举措使吏读的影响力逐渐削弱，汉文的地位更为牢固。到了13世纪，吏读文的使用范围更加狭窄，社会功能进一步弱化，除了官方的文书、碑文、固有的诗歌之外，一般的书写活动都采用了汉文，吏读文的构成和表现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吏读词汇和汉字标记词汇都被汉文的汉字词汇所取代，变成只有汉字词汇和表音字标记朝鲜语词尾的吏读形式。

14世纪末，随着古代朝鲜半岛的王朝更迭，吏读文又发生了变化，形成了语序遵循朝鲜语语序，词汇以汉文词汇和汉文词组为主，同时夹杂使用吏读词汇，而语法形态则完全采用表音字的形式。1395年在朝鲜半岛翻译刊印的《大明律直解》可谓是这一时期吏读文的典范，引用其中的一段如下：

汉文原文：凡無文引，私度關津者杖八十。若關不由門，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越渡

^① 指朝鲜自创的汉字词汇。

^② 朝鲜统一新罗时代盛行的诗歌形式。

^③ 与新罗时期的“乡歌”区分，收录在《均如传》的高丽时期“乡歌”为“均如乡歌”。

緣邊關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出外境者絞，守把之人，知而故縱者同罪，失於盤詰者，各減三等，罪止杖一百，軍兵又減一等，并罪坐直日者^①。

吏读译文：凡行狀無亦 防護所及津渡良中 過越爲在乙良 杖八十齊。若防護所良中 中門以出去不冬爲旂，津渡良中 官渡以出去不冬爲遣，佗處以渡越爲在乙良杖九十齊，邊境防護所過越爲在乙良杖一百徒三年遣，因此彼境出去爲在乙良絞死齊，看直人亦知情放送爲在乙良罪同齊，不能考察爲在乙良各減三等杖一百爲限齊，軍兵是去等又減一等論罪爲乎矣，同日日守軍人乙坐罪齊。

如上文所见，吏读文和汉文原文一样，都采用了汉字，但是词汇意义、篇章的语序和句法结构关系所反映的是朝鲜语的特点。如汉文原文中的“無文引”“私度關津”是述宾结构，而吏读译文“行狀無亦”和“防護所及津渡良中 過越爲在乙良”分别是主谓结构和状中结构，反映的是朝鲜语的语序；汉文原文中的单音节词语“度”“關”“津”在吏读译文中对应为朝鲜语多音节汉字词“過越”“防護所”“津渡”。还有，在吏读译文中出现的“無亦—畊[○][apei]”“不冬—안^한[andel]”等是朝鲜语的吏读词汇，更有趣的是吏读译文中的“亦[i]”“以[ro]”“爲旂[hamyʌ]”“良中[ahe]”“爲遣[hako]”“齊[tsε]”“爲在乙良[hagyʌnnullarj]”“是去等[igʌduun]”“爲乎矣[haodwe]”所标记的是朝鲜语的语法形态，这些现象足以表明吏读文是当时朝鲜语的书面语，而且已经相当成熟。与早期的吏读文《新罗华严经写经造成记》等比较，《大明律直解》中出现的吏读汉字的体系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朝鲜语词尾的借音标记方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已经能够标记相对复杂的语法形态。

总之，吏读文的产生和发展反映当时的朝鲜半岛人民为了寻求适合朝鲜语口语的书面语系统而做出的不懈努力与探索，吏读文的使用也对朝鲜语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朝鲜汉字音的形成，汉字词汇的扩大与普及，古朝鲜语向中世纪朝鲜语演变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吏读文的影响。

四 吏读文对汉字的创造性发展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属于语素文字（朱德熙 1999:211），它与以单音节词为主的古代汉语相适应，是在汉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及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超地域、超时代的独特功能（李德春、金基石 1997:41）。但对朝鲜民族来讲，汉字毕竟是外民族语言的符号体系，不能完全记录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和独特的语音系统的朝鲜语，因此，从完全借用汉字逐渐发展为改造汉字，甚至仿造汉字，体现了朝鲜民族吸收汉字并实现其本土化的不懈追求。吏读是按照朝鲜语结构改编并用于记录朝鲜语的汉字书面语，吏读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吏读的各种形态，如吏读文字、人名和地名的借字标记、口诀、吏扎等，这些都离不开汉字的形、音、义和造字原理，也不能摆脱朝鲜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吏读实际上是汉字和朝鲜语的结合体，既有汉字的特征，又有朝鲜语的因素。吏读的这种双重性特征反映在吏读文字、吏读借音法、吏读借意法和借音借意并用法等方面。

（一）吏读文字

吏读文字是指用汉字的字形标记朝鲜语词汇的文字，体现了“朝鲜语式”的汉字用法。

^① 出自《大明律直解》卷 15 《关津》，第一篇：私越冒渡关津。

吏读文字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给原有的汉字赋予朝鲜语的词义，如，汉字“洞”在汉文中表示“岩窟石穴”，而在吏读文中表示“街坊”；“库”在汉文中表示“仓库”，而在吏读文中表示“场所”。二是采用中国古代“六书”的汉字造字原理，创造出表示朝鲜语词义的汉字（陆锡兴 2018:464）。例如：

象形字：“今—叩[mā]”表示“锤子”，像锤子的头和柄。

形声字：“𦨇—𦨇[kʌ]”表示“小舟”，从舟，居声。

会意字：“畠—畠[tap]”表示“水田”。

如上例所示，这些自造的吏读文字模仿了汉字的方块形体，同时又体现了汉字的造字原理，因而得到了当时朝鲜半岛社会的认可，广泛适用于各种吏读文，用来标记有别于中国的一些事物。

（二）吏读借音法

吏读借音法体现在吏读汉字体系中的表音字上，最初用于标记朝鲜半岛的人名、地名，如人名“邹牟— 추牟[tsh'umo]”、地名“史勿—사물[samul]”等。随着吏读文使用范围的扩大，表音字逐渐用于标记朝鲜语语法形态和多音节语素，所用的借音标记与朝鲜语口语的实际发音较为接近，如汉字“亦”“隐”分别表示朝鲜语主格词尾“ㅇ[i]”和辅助词尾“은[un]”等。这类吏读借音法利用的同样是汉字的字形和字音，否则不可能实现吏读作为书面语的功能。

（三）吏读借意法

吏读的汉字借意法主要体现在训读表意字和训读表音字上，这类标记法保留汉字的字形，摈弃字音，采用对译的方法。训读表意字主要用于人名、地名的命名以及与汉字意义相对应的朝鲜语固有词汇的标记。这种借字表意的方法从一地多名的现象中可以看出，如《三国史记》^①中出现的“丹川县”原指百济的“赤川县”，是当今“朱溪县”，其中，“丹”“赤”“朱”三个汉字尽管读音完全不同，但字义有联系，都表示“颜色红”，可看做是异音同义字，而“川”和“溪”都可指“河”，也是异音同义字。训读表意字借汉字的字形，采用“取意对译”的方式。训读表音字则是与上述训读表意字互补的借字借意用法，主要用于弥补训读表意字不能标记朝鲜语语法形态的缺陷，采用的方法是借汉文中表示语法意义的汉字虚字或表示方位意义的方位字标记朝鲜语词尾。如，借“以”字表示朝鲜语工具格词尾“-豆[ro]”，借“中”字表示朝鲜语位格词尾“-에[e]”，借“如”字表示朝鲜语终结词尾“-다[tɑ]”等。训读表意字和训读表音字的共同特征是都借用汉字的形和义，不同的是，训读表意字表示朝鲜语的固有词汇，而训读表音字表示朝鲜语的语法形态。

（四）吏读中的借音借意并用法

吏读文在借用汉字记录朝鲜语的过程中，有时需要借汉字的字音、字形或字义，有时需要拆开汉字的字音和字义之间的联系，而更多的时候需要依据朝鲜语的语音、词汇和句法结构特点，并用借意法和借音法，从而产生了借意的汉字在前、借音的汉字在后的吏读文的篇章顺序。下面以一首“新罗乡歌”^②《祭亡妹歌》里的一段为例：

吏读文：一等隱 枝良 出古 去奴隱 处 毛冬乎丁

^① 1145年受高丽王朝仁宗王之命，由金富軾等人编撰的朝鲜三国史书。

^② 指古代朝鲜半岛固有的一种诗歌形式，起源于6世纪末7世纪初。

中世纪朝鲜语译文: 하든 가지라 나고 가논 곧 모들은데[haden kadzira nako kanon kot moderun te]
汉文译文: 出于同一树枝, 却不知所去之处。

在这一段吏读文中, “一”是训读表意字, 只取字义; “等”和“隐”是音读表音字, 分别取两个汉字的辅音和韵尾, 合成标记朝鲜语语法形态“-드[dən]”; “枝”是训读表意字, 只取字义, 表示朝鲜语中的“树枝”义; “良”是音读表音字, 只取字音, 标记朝鲜语语法形态“-라[ra]”; “出”是训读表意字, 只取字义, 表示朝鲜语中的“出生”义; “古”是音读表音字, 只取音, 表示语法形态; “去”是训读表意字, 取字义, 表示朝鲜语中的“离开”义; “奴”和“隐”是音读表音字, 合成标记“-논[non]”, 表示定语词尾; “处”是训读表意字, 只取字义, 表示朝鲜语中的“处所”义; “毛冬乎丁[moderunte]”四个字都是音读表音字, 合成标记“不知道”的朝鲜语音。可见, 吏读文的句子结构一般是表意汉字在前、表音汉字在后, 构成“表意字 + 表音字”的结构, 是当时记录朝鲜语的通用书面语。

五 吏读文对朝鲜语及朝鲜文字的影响

吏读是汉字在朝鲜半岛实现民族化、本土化的产物, 从产生、发展到消失, 经历了一千多年。这期间吏读对朝鲜语及书面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吏读文的使用, 丰富了朝鲜语的语音系统。

从朝鲜语的语音发展历史来看, 古代朝鲜语的音系中没有“ㅋ[kʰ]”“ㅌ[tʰ]”“ㅍ[pʰ]”“ㅊ[tʂʰ]”等送气音, 这类送气音是伴随汉字的输入和吸收融入到朝鲜语的, 如“快—��[kʰwe]”“吐—豆[tʰo]”“破—啵[pʰa]”“赞—찬[tʂʰan]”等。送气辅音的出现渐渐形成了朝鲜语辅音的送气音系列, 使得朝鲜语语音系统构成送气音、不送气音、紧音三元对立的辅音体系。尽管有的汉字随着朝鲜语语音系统的演变发生了一些变化^①, 但多数汉字的音仍然或多或少地保留了汉字原有的语音特征, 并丰富了朝鲜语的语音系统。

(二) 吏读文的使用丰富了朝鲜语的词汇系统。

朝鲜语中的汉字词汇是朝鲜语词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约占朝鲜语词汇的 50%以上^②, 如此之多的汉字词汇首先是在吏读文的使用过程中进入朝鲜语词汇系统的, 此外也有近现代从中国和日本引进的汉字词汇, 还包括在朝鲜半岛利用汉字原理自造的汉字标记词汇, 如“上殿—상전[saŋdʐʌn]”指进入宫殿, “水刺—수라[sura]”指国王的饮食, “上监—상감[saŋga m]”表示对国王的尊称等。汉字词汇以表意精炼、理据性强、文雅、寓意深刻等特点, 广泛应用于朝鲜语书面语中, 有些汉字词甚至取代了朝鲜语固有词, 如汉字词“山—산[san]”取代固有词“뫼[moi]”, 汉字词“江—강[kaŋ]”取代固有词“ każdym[kerəm]”等, 极大地丰富了朝鲜语的词汇体系。

(三) 吏读为朝鲜民族文字——“训民正音”的创制提供了实践依据。

首先, 训民正音的字形仿照了汉字的方块字, 《世宗实录》(世宗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第102卷记载: “是月上亲制谚文二十八字其仿古篆”。早在训民正音创制以前, 便设有“司译院”, 搜集并掌握了蒙古语、女真语、倭语等语言, 对表音字母文字有了一定的了

^① 语音演变包括颚化现象, 即, “ㄷ[tu]“ㅌ[tʰu]等辅音在元音“ㅣ[i]”前变为“ㅈ[tsu]“ㅊ[tʂʰu]”, 如, “天”字的读音由“톈[tʰyen]变成“천[tʂʰʌn]”。

^② 《朝鲜语小词典》共收词 41927 条, 其中固有词为 18117 条, 占 43.3%, 汉字词为 23810 条, 占 56.7%。

解，但之所以最终没有采用表音字母的字形而采用汉字的方块字形，就是在长期使用吏读文的过程中，熟悉和掌握了汉字的结构和造字原理，因此制定了以元音字母为中心，上下左右加上辅音字母的方块字形。

其次，训民正音的初声、中声、终声三分法正是古代朝鲜半岛人民在使用吏读汉字的过程中，审视和发现朝鲜语的音系特征和语法结构特征之后创立的朝鲜语字韵三分的理论体系。吏读文的借音标记法从汉字反切法，即声母和韵母切分标记的方法中得到启示，利用“音”“邑”“师”等汉字的音分别标记了朝鲜语的辅音韵尾音“口[m]”“日[p]”“入[s]”等，如朝鲜语的王号“尼今[nitkum]”用吏读汉字标记为“尼师今”，其中，“师”的声母表示第一个音节“尼[nit]”的韵尾“入[s]”。

此外，吏读的“表意字+表音字”的结构标记方法，为训民正音提供了汉字词汇上缀^①、固有词汇下缀^②的标记规则，从吏读标记中发现的词与词尾的区分方法，也为训民正音的标记规则提供了参考依据，对后来的朝鲜语语音研究和形态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 结 语

朝鲜半岛接受汉字、汉文并使之本土化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因素。汉字从甲骨文算起，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东亚各国还没有文字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了承载优秀文化的载体——汉字。公元前前后，随着汉字、汉文传入朝鲜半岛，对形成和发展朝鲜语的书面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汉字在朝鲜半岛的本土化过程，对朝鲜半岛的语言文字生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单从语言文字方面看，直到19世纪末，汉字、汉文都处于正统文字和书面语的地位，凡是国家颁布的重要文件，如敕令、外交文书、历史文献等都是汉文。而被称为“第二书面语”的吏读文，主要使用于封建官方文书、合同、契约等领域，其地位仅次于汉文，一直沿用到1894年^③。吏读是汉字和朝鲜语结合形成的书面语形式，尽管吏读无法完全克服属于孤立语的汉语的汉字和属于黏着语的朝鲜语之间的矛盾，但充分利用汉字的要素和汉字的功能，尽可能地记录朝鲜语并使之成为官方书面语，不能不说是一种创举。同时，汉字在朝鲜半岛的本土化过程中构成了汉语和朝鲜语之间鲜明的对比，加深了朝鲜半岛人民对朝鲜语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的理解，丰富了音韵学知识，为训民正音的创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依据。

汉字是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却在朝鲜半岛生根发芽并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汉字的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超地域性特征以及汉字作为先进的汉文化载体的属性，是非常重要的客观因素。同时，在朝鲜半岛积极接受汉字及汉文并使之民族化、本土化的经验和方法也值得进一步研究，因为它对我们深入挖掘包括汉字在内的中华文化的精髓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朝鲜总督府中枢院. 1936.《校订大明律直解》（影印本），京城府：朝鲜印刷株式会社.

^① 上缀是形态主义标记规则，汉字词和词尾的形态固定不变。

^② 下缀是表音主义标记规则，按朝鲜语连读音标记的规则。

^③ 朝鲜王朝1894年11月21日颁布“朝汉文混用”敕令为止。

- [2] 陈 榴. 2007. 《东去的语脉》，沈阳：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 [3] 李得春. 1992. 《汉朝语言文字关系史》，延吉：东北教育民族出版社.
- [4] 陆锡兴. 2018. 《汉字传播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 [5] 吴希福. 1999. 《吏读》，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社.
- [6] 延边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009. 《朝鲜语小词典》，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 [7] 杨昭全、何彤梅. 2001. 《中国与朝鲜·韩国关系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8] 俞晓红. 2019. 《朝鲜半岛汉字本土化历史及相关术语》，《齐齐哈尔大学学报》第6期.
- [9] 朱德熙. 1999. 《朱德熙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 [10] 김무림. 2015. 《고대국어 한자음》，서울：한국문화사 (金武林. 2015. 《古代国语汉字音》，首尔：韩国文化社).
- [11] 남풍현. 1986. 《차자표기법연구》，서울：단국대출판부 (南丰铉. 1986. 《借字表记法研究》，汉城：檀大出版部).
- [12] 남풍현. 2000. 《이두연구》，서울：한국태학사 (南丰铉. 2000. 《吏读研究》，首尔：韩国太学社).
- [13] 최남희. 2006. 《국어사와 한자음》，서울：박이정도서출판사 (崔南熙. 2006. 《国语史与汉字音》，首尔：博而精图书出版社).
- [14] 홍기문. 1957. 《이두 연구》，평양：조선과학원출판사 (洪起文. 1957. 《吏读研究》，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

Chinese Characters and Korean Idu Writing System: Relationship and Influence

JIN Yongshou and SHANG Yongmei

[Abstract] The Korean Peninsula has seen a history of two thousand years in its acceptance and 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long history, Chinese characters got deep-rooted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in the meantime of directly using Chinese characters, a localized Idu writing system was devised to represent the Korean language using the forms, sounds and meanings of Chinese characters, or hanja. The use of the Idu writing system greatly enriched the phonological and lexical systems of Korean. In the meanwhile, the Idu writing system deepen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Korean language,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Hunminjeongeum.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s the Korean Peninsula Idu writing system localization influence

(通信地址：金永寿 133002 延吉 延边大学朝汉文学院
尚咏梅 130033 长春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朝韩所)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